

抗日战争时期，在胶济铁路沿线活跃着一支由铁路工人组成的抗日武装——张博铁道大队，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破袭战，组织大小战斗二百多次，炸毁了日军的“国际列车”，在国际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1937年底，日军占领了胶济铁路，大批铁路员工失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2月，廖容标、姚仲明、马耀南在张店以北三十华里的黑铁山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点燃了淄博地区抗日斗争的熊熊烈火，从此大批失业铁路工人纷纷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积极投入抗日斗争。

1938年5月，原为张店机务段火车司机的邹光中从徐州回到淄博，他以第五战区职工抗日联合总会主任的身份，与中共淄川矿区区委书记张天民取得联系，在淄博恢复重建五战区工会，接着又在佛村的吕家祠堂里，正式成立了胶济铁路职工抗日联合会，为五战区工会的下属组织。

胶济铁路工会成立后，受到了广大铁路员工的欢迎。它虽是个群众团体，但在战争形势下，却既要做群众工作，又要搞武装斗争。因此，工会相继派出翟运泉、张益三等深入铁路沿线各站段，发动职工参加工会，派出张文亭、孟昭铸等到附近农村筹款买枪，组建铁路工人武装。不久，就有姚福佩、张守润等二十多人参加，经邹光中与张天民等商定，在胶济铁路工会领导下成立了张博铁道大队，并由邹光中兼任大队长。为加强政治工作，1939年5月五战区工会把孙刚从淄博矿区工会武装部调出来，到张博铁道大队任政治指导员。

张博铁道大队创建初期，就以铁路为战场，展开铁路破袭战，多次扒铁路、袭车站，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铁路职工加入进来，队员很快扩充到七八十人，最多时达到二百多人。张博铁道大队的战斗力很强，他们主要活动在胶济铁路张店、辛店、周村间和张博铁路支线，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在铁路沿线开展破袭战。队员们以铁路工人特有的技能和便利条件，经常袭扰车站、扒路破轨、炸毁桥梁，搞得敌人提心吊胆，昼夜不安。

在一年多时间里，张博铁道大队组织大小战斗上百次。1938年7月，在八路军配合掩护下，张博铁道大队和其他抗战队伍一起发动当地群众，一夜间，将张店至淄川间12华里铁路扒毁，炸桥三座，使张博支线一个月不能通车，洪山煤矿煤炭不能外运，驻洪山的日军给



张博铁道大队整装待发奔赴抗战前线

【齐鲁英雄谱】 日军“国际列车” 张博铁道大队炸毁

□ 张汝峰

养断绝。日军只得冒险下山抢粮，又遭到八路军包围痛打。同年冬天，张博铁道大队在矿工的支援下，派人到胶济铁路金岭镇、辛店间，把用黄炸药制作的爆炸物放在钢轨接头处，炸毁日军轨道车，十个日本兵连人带枪飞上了天，极大地震慑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8年7月初，八路军第三支队和新建的中共清河特委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铁路破袭活动，分配给张博铁道大队的任务是炸毁张店火车站的电灯房，以破坏敌人的运输。

日军占领淄博后，大肆掠夺煤铁等资源，张店火车站运输任务异常繁忙。在部署作战

方案时，考虑到副大队长姚福佩原来是电灯房的工匠，熟悉情况，决定由他带领部分队员去执行任务。但是铁路工人不熟悉爆破技术，怎么办？只能请外援，最后从矿区工会武装部请了老矿工张德水参加这次破袭任务。

1938年7月上旬的一天傍晚，他们化装后进入张店市区，其他人埋伏在电灯房周围负责警戒掩护，姚福佩、张德水等三人换上工作服，顺利潜入电灯房内。姚福佩向值班工人说明来意后，他们愿意配合行动。就在张德水准备安装炸弹时，忽然值班的日本兵来了，三人急中生智，顺手拿起棉纱，用力地擦起机器来。日本兵对里面的工人并不熟悉，见他们满头大汗，便伸出大拇指说：“你的干活的顶好，辛苦大大的。”

等日本兵走后，张德水熟练地把炸弹放进机器内部，很快装好了引爆装置，然后让值班工人去向日本兵大声吆喝：“八路军来了！”、“八路军进厂了！”趁日军慌乱时，张德水拉响了导火线，立即“轰隆”一声，地动墙摇，火光冲天，两台价值数百万日元的发电机全部被炸毁，张店火车站一片漆黑，铁道队员安全撤出。电灯房被炸毁后，日军很久未能修复，有效地破坏了日军的货运计划。

1939年4月1日，日军占领下的津浦铁路全线修复通车，日军便大肆吹嘘“南北通车即可征服中国”。为了炫耀他们的“赫赫战绩”，日军特地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定做了一列最新式、最阔绰、最漂亮的列车，名字叫“国际列车”，车头上插着太阳旗，车上载着日本和外国的记者，妄图利用新闻工具作欺骗宣传，制造舆论。

4月下旬，潜入北京的国民党情报人员获得了“国际列车”从北京开出的消息，并迅速报

告给了山东省政府。23日下午两点，张博铁道大队接受了在泰安附近炸毁该列车的任务，由省政府所辖第四师一营配合。张博铁道大队副大队长张文亭带领三十多人，连夜从鲁村出发，一路急行军，于4月30日晚赶到东北堡车站以北地区隐蔽起来。等了一段时间，远处传来汽笛声，从时间判断，列车还不会到来，所以队员们并未动手。过了一会儿，果然开过来一列铁甲车。

因为日军已被铁道队多次破路吓破了胆，所以对“国际列车”采取了特别严格的防护措施：前面有铁甲车开路，路基两旁撒上石灰，像白带子一样把铁路夹在中间，列车每走一段，就停下来检查铁路状况。

但是日军再狡猾，也斗不过中国铁路工人。铁甲车开过去后，大家马上行动，有挖坑的，有埋雷的，有站岗警戒的，把导火索安装好撤离铁路时，再把准备好的石灰撒上，一切恢复原样。过了几分钟，“国际列车”真的开过来了。快到埋雷地点时，列车停了下来，跳下几个日本兵，打着明晃晃的手电检查路基。队员们非常紧张，生怕被敌人发觉。日本兵走了几步，并未发现可疑迹象，列车继续向前开动，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到了爆炸地点时，“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三节车厢翻滚到路基下，列车顿时瘫痪，铁道队员和四师一营官兵立即冲过去，把手榴弹扔进车厢里，击毙了全部随车日军，并向车上的记者散发了抗日传单。这次爆炸事件使日本侵略者在国际上陷于极端狼狈的境地，张博铁道大队名声大震。

1939年10月，中共山东分局把张博铁道大队改编为山东工人第六支队，1940年第六支队正式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后勤司令部。

【老照片】

1961年的医疗队

□ 郑世兴

1961年秋天，淄博市王村地区爆发白喉病，市里迅速从各单位抽调了近40名医务人员组成一支防治白喉医疗队。这张照片就是医疗队组建不久后全体成员一起照的合影。

淄博市卫生防疫站时任防疫科科长杨志民（二排左五）任领队，我（二排左七）负责住院病人的治疗工作。病房就设在王村西门外已搬迁走的淄博十七中教室里，最多时患者超过了百人。

在医疗队工作的日日夜夜里，几乎每天都有紧急的救护故事“上演”。白喉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严重时会引起心肌炎和神经瘫痪。记得一天夜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因白喉假膜脱落致喉梗阻，呼吸困难几乎窒息。我全力指挥并带领医生进行救治，曹务岭医师不顾自己被感染的危险，毅然实行了口对口人工呼吸，随即我与曹大夫、董建业大夫共同为患者实施了气管切开术，挽救了孩子的生命。医疗队急需白喉抗毒素，我连夜骑自行车往返百里去取，以解燃眉之急。

严冬，只有病房里生了火炉，医务人员住的平房里夜间温度达零下十几度，有时还要冒着风雪出诊。有的病人患心肌炎，医护人员就日夜守护在病房。那时正值困难时期，队员们生活非常艰苦，日夜连轴转地工作，没有任何补贴，更没有休息日，1962年春节也没放假。附近的老百姓从家里背来煎饼、咸菜，给大家权当夜班饭，医护人员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

次年春天，疫情完全控制，病人先后康复出院，共同战斗了半年多之久的我们，各自回单位工作。那时的小伙子、大姑娘，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有的老同志已经作古。看到这张当年的照片，怎不感慨万千？



【故人往事】

章丘诗人一封信 促《诗刊》复刊

□ 王绍忠

“云鹊爱唱喜盈门，柳莺爱唱艳阳春；山民爱唱丰年调，政策开花结黄金。”这是章丘明水公社侯家村学校教师谢永祥，于1967年在全省刊物《山东民兵》（由济南军区主办）新年专刊号发表的一首新民歌。

生活中年轻人有球迷、花迷，年长者有棋迷、茶迷、戏迷等，谢永祥却独爱诗歌，人称“诗迷”。一册《唐诗三百首》，可以背诵如流。教课之余，学诗成为他唯一的嗜好；发现书店有新诗集上柜，他便立马购买、收藏。1958年下半年，全国掀起了空前的“全民写唱新民歌”热潮。老幼写诗、男女对诗、全家吟诗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后来，一则甘肃农民诗人王老九要进京同郭沫若先生赛诗的新闻轰动全国。谢永祥深受激励，坚定了他对编撰民歌的信念，自此“一日一诗”成了习惯。据时任章丘文化局长靳凤尘及文联主席任方桐说，谢老师半辈子写的民歌有万首之多，还被时任公社教委誉为“一号诗人”。

1974年11月下旬，在全国各条战线“抓革命，促生产”、“大干快上”的热潮中，谢永祥想起影响全国诗坛的大型文学期刊《诗刊》已停办多年，应该尽早复刊，迎接文艺春天的来临。于是他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提出《诗刊》应早日复刊的诚挚恳求。

信件寄出半月后，他接到了《红旗》（现为《求实》）杂志社的来函，表示来信收到，已送交主席处阅。12月上旬，他收到从北京捎来的第二份惊喜，来函告诉他“主席对你的诉求，已用红笔作出‘同意复刊’的批示”。1975年元月下旬，他又收到《诗刊》社发来的喜讯，一封报喜信和两册新《诗刊》。



谢老师“一信三喜”的消息，如同报春的吉祥鸟，立时飞遍明水全社。时任县档案局局长的冯仁烈对谢老师表示，档案馆希望将他的“北京三信”收藏。淳朴憨直的谢老师对贴身携带的“三信”视若珍宝。冯仁烈非常尊重他的意愿，表示可以过一段时间再送交馆内收藏。

新生的《诗刊》问世后，激发起谢永祥业余创作的第二次高潮。后来，他因在校连年送“戴帽”（初中）毕业班，家中老母又患脑中风，便把创作宗旨修定为“一周一诗”。上世纪80年代末，章丘是在全省建立“文联”的第一批县市，谢永祥又迸发出第三次创作激情，每周日下午必进文联送稿、改稿，当时文联主办了两个刊物《绣江文苑》和《寒泉诗刊》，常常能看到谢老师的诗歌。

2017年元月是《诗刊》创刊60周年大庆，1975年获得“新生”，对于编辑部来说，无疑是一大幸事、喜事，他们自然会追忆起当年向毛主席写信的那位“恩人”。2016年11月中旬，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复春和《诗刊》社主编商镇到国家档案馆查询，得知毛主席批阅了“同意复刊”的信件已划归“一级绝密”，不可拍照、不能复印，更不准带出馆。他们阅览了一遍，方知当年写信人的姓名、地址。编辑部计划邀请这位“功臣”参加盛典当面致谢。

只是，辗转联系到的消息却令人伤心，谢永祥已在几年前病逝。在他有生之年，他最大的愿望是将自己精心整理出的新民歌300首装印成册，践行自己坚守传统文学的诗歌之约。